

理论探讨

建国60年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鱼俊清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西安 710068)

摘要: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建国60年来, 我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 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统一战线、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期的统一战线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爱国统一战线, 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理论经验, 为发展新形势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统一战线; 理论; 实践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0)02-0074-04

United Fro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Our People's Republic

YU Jun-qing

(The Political Institute of Liberation Army of Xi'an,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n united front is the fundamental on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our People's Republic.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s and tasks, Our Party has formed the united front during socialist reform, explored both the united front during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patriotic united fro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theory of united front, which provide a great deal of enlightenment for our Party's united front at the present time.

Key words: united front; theory; practice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建国60年来, 在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中,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 在改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 我党十分注重发挥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威力, 不仅继承了党在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 而且发展了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使统一战线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建立后,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未完成的任务, 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围绕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这一最根本的任务, 统一战线工作全面展开, 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相结合, 创造性地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

(一)“不要四面出击”的统一战线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 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我党调整和理顺统一战线内部各个阶级的关系,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一致对敌, 保证争取国家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任务的完成, 于1950年6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 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全面而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形势, 认为国际的情况和国内的形势对我们利多弊少, 全国人民当前应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其中包含了统一战线方面的政策, 如土改工作, 要涉及到对富农、中农的统战工作问题; 财经管理涉及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小资产阶级的统战问题; 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及旧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涉及到对知识分子的统战问题等等。

为了突出统一战线工作在当时的重要性, 明确统

理论探讨

战工作在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毛泽东指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对“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1]76}“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敌友观,明确了打击的对象,指明了团结、依靠的力量,主张孤立少数敌人,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不要四面出击”所提出的策略思想,符合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战胜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个策略思想对以后的统一战线工作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二)工农联盟理论的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老解放区已有1.6亿人口的地方完成了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还有近3亿人口的地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对广大农民的统战政策如何,不仅事关工农联盟的巩固,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统一战线基础的巩固。为此,在制定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路线政策时,中央的态度非常谨慎,多方征求意见,力争制定出一条既符合实际情况,又能团结大多数人为完成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服务的土地路线。毛泽东当时指出:我们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1]70}在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中央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制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这一路线更注重了对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的团结和保护,注意了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体现了建国初期统一战线思想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到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推翻了长期压迫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树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不仅加强、巩固了工农联盟这一统一战线的基础,而且也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三)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思想及实践

建国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着一定关门主义的倾向,有些人主张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斗争的主要对象,挤垮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持此论者只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否认其积极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时地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观点,坚持并发展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

毛泽东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

须团结它,要采取既团结又斗争并以团结为主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后来,周恩来又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2]1952年开展的“五反”运动既是对资产阶级一次集中的反击运动,又是一次集中的改造、教育运动,充分体现了党又斗争又团结并以团结为主的统战政策。经过“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也教育、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巩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到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考察建国以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并写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在1953年6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维汉把这一方针写成《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提交会议讨论。9月,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重要讲话。总的来看,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理论观点有:第一,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第二,利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第三,把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第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

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是对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突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成功的经验。

二、1956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使我国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革命时期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仍然是不可缺少,那么其性质、作用、形式等又该是如何呢?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进行了认真的理论探索。

(一)1956年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式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方针。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3]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4]此后,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讲话中,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中多次引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八个字,成为党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李维汉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

理论探讨

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方针。”^[5]1957年4月，周恩来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生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其目的是为了扩大民主，“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国家。要把六亿人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6]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理论，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澄清了人们对各民主党派作用的模糊认识，扩大了人民民主，鼓舞并调动了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热情，从而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二)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党的统一战线受“左”倾错误影响出现挫折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但是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统一战线出现了曲折和失误。

八届二中全会后，全党实行开门整风。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民主党派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党的统战工作因此受到挫折。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又错误地开展对李维汉提出或执行的正确统战理论的两次错误批判，集中起来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宗教”的提法和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短期消灭资产阶级等所谓“五社一短”的“修正主义纲领”问题。两次批判在一系列重大统战理论、政策上颠倒是非，而且1964年又撤销主管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李维汉同志的一切职务，造成了统战工作中巨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将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统战理论，强加上“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系统地加以批判，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理论，当作马列主义加以宣扬，实际上否定了1956年以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造成了党的统一战线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的局面。

(三)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党的统一战线遭受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推行极左路线，全盘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统战工作，肆意践踏党的统战理论和政策，把新中国建立17年来党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诬蔑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们鼓动造反派冲击党的各级统战机构，使之被迫停止工作；他们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界爱国人士、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原工商业者，作为“专政对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八个民主党派均被迫停止活动，成员由“文化大革命”前的8.3万人减少到7万人左右。党的统战工作遭到全面破坏，教

训极为深刻。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保护了一批被批斗的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竭力维护党的统战理论和政策，尽可能地减少统一战线工作的损失，才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没有被完全摧毁。

(四)1976年10月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统一战线在恢复中徘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统一战线工作也得到初步恢复。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重新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指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同年9月，邓小平在国务院国庆招待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2月，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四届常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讲话，阐述了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问题，重申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强调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和宗教政策，恢复和发扬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继续贯彻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但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指导，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统战理论的拨乱反正陷入了徘徊的局面。面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给统一战线工作造成的干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激烈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阻力，开始部分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和侨务政策等，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展现出新的生机，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进一步恢复和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初步基础。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思想

1979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把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7]^[85]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接受了邓小平的提法，正式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并指出：“一定要毫不动摇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爱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首先，强调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其次，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和对象；再次，具体明确了爱国统一战线当前应主要做好的工作。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不仅仅是统一战线称谓上的变更，它更反映了国内阶级状况和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说明统一战线的性质已经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

理论探讨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盟已经从过去的阶级关系的联盟转变到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同各界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政治联盟了。

(二) 确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7]1982年1月5日,胡耀邦在15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并指出完善这个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国家的意志;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三大制度之一,列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政党关系理论。胡锦涛指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实现我国政党关系的长期和谐,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些观点为深化党同民主党派关系的认识,促进党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角度。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推动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的巨大发展。政治协商方面,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从内容到程序的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参政议政方面,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作了进一步具体规定,进一步拓宽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的渠道,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显著。民主监督方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方针,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三)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与实践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意志和历史的潮流,提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原则和改善两岸关系的具体措施。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对《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方针政策作了全面的阐明,具体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大致勾勒出了“一国两制”的轮廓。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中谈到香港前途问题时提出了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改革。香港人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还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就是一个新的思想。1984年5月,“一国两制”的构想写进了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的前提是祖国统一,“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8]在“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引下,党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12月1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香港、澳门的回归、“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的方针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极大地促进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蓬勃生命力,是我党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实践的最大成果。

(四) 关于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时期。在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原有“两阶一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我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脱胎于原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基本社会阶层,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界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此,党适应形势任务发展的需要,把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一整套策略方针。2006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二十字工作方针”。即“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更加明确了引导新的社会阶层自觉履行义利兼顾、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造福人民的方向。

新的社会阶层统战理论的提出,为统一战线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新的社会阶层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新的社会阶层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次,新的社会阶层“共商国是,同谋大计”的政治夙愿得以实现。再次,新的社会阶层力量不断壮大。根据统计,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大约已有7500多万人。^[9]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5-97.
- [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N].人民日报,1976-12-26.
-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813.
- [5]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9-148.
- [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8-352.
-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G].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16.
- [9]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干部读本[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72.

[责任编辑:任山庆 校对:叶慧娟]